

向人民学习 向生活学习

繁荣新时代农村题材

文学创作笔谈(之九)

写出乡村文化精神嬗变时的艰难与创新

□杨献平

四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不仅物质生活渐趋富足,城乡之间差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缩小,人们在精神文化追求上日渐复杂化、多样化,诸多的外来文化不仅穿街过巷,风行于城市,也经由某些特定人群还有便捷的网络,对广大乡村产生无形且强烈的、以点带面的影响。我们的乡土文学创作,重心和主要笔墨放在了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等重大主题上,书写的对象主要是乡村当中具有开拓精神、不断走上共同富裕的人群。这些创作抓住了时代的主潮,当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文学意义。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对于乡村逐渐流变的文化需求和精神追求方面关注不多,用笔甚少。文化、精神问题关乎人的心灵建设,关乎民族信仰,关乎人的“自制”“自治”“自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融”“共进”“和谐”。人之为人,不仅要物质富足、无虞,精神文化的需求更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这是影响人们精神层次及其境界提升的关键因素。

乡村人精神文化的嬗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多年来,我一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游走,城市是工作之地、生存之所,乡村则是生身之处、根脉所在。每一次回乡,我都觉得格外新鲜甚至诧异。其一,从外观甚至表现形式上看,乡村与城镇之间的差异缩小,真可谓“忽然之间”。尤其衣食住行,城乡之间已经没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各种装饰豪华的楼房、代步轿车、各式电器在乡村的兴起与流行,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物质上的充裕程度,另一方面则是乡村模仿城市的直接表达。其二,由于个体现实生活各种“必需”和不同境遇,很多乡村人不得不走出自己的农家之门,以购房、打工和做生意的方式到外地生活,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城市居住的人,既热爱城市的各种便利,却又舍不得村里的房宅田地。这些人进城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其次是就近就医养老。天长日久,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却又渴望回到乡村,在相对宽敞、自然、随意的环境中生活。这就导致了人的自我的内心冲突与矛盾。而这些“冲突和矛盾”在很多时候也间接或者直接地造成精神上的困惑、迷惘甚至偏执、偏激。其三,良莠不齐的外来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下移”“沉潜”,已经在根本上触及了固有的文化精神以及人们的心灵信仰,大多数以“东施效颦”“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的方式,对乡村文化、传统精神进行“移花接木”式的“解构”“篡改”,以至于当下的农村,即使地处偏远,也难以避免。

乡村是农耕文明最后的晚照,是传统文化的根脉之地。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从文化认知开始的,农耕文化的形成自有其土壤,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以及强烈的民族、家和文化上的认同感,以及在长期的生活之中形成的敬天悯人、家国情怀、故乡情结、乡亲观念,以及对同一地域风俗习惯的亲感和、身体力行的传承与弘扬等,都是其中的优秀部分。当下的城市文明与外来文化不断以各种面目、形式进入,已经对乡村社会产生了较为强劲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以粗暴的方式出现,而是以各种柔性、弹性极强的方式,进行温和的“介入”和“蛊惑”。据我个人观察体验,乡村文化传统和人的心灵嬗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在孝老爱亲方面的意识“出离”和悖“理”;二是文化上的“鄙己”“尚外”;三是行为上不明就里的模仿和“看齐”;四是思想观念的自相



矛盾与无意识“挟洋自喜”;五是自我认知和判断上的混沌盲目。当然,我是偏重于以“问题”的视角对这一进程进行分析。客观来讲,城市文化、外来文化的进入,也使乡村空间变得思想越来越开明、现代,带来诸多好处。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嬗变,我们不能简单地进行是非判断,而是要深入分析其中的内在机制,寻找到融合、突破的新可能。

新的精神景观需要新的文学表达

文学创作必须是开放的、兼容并蓄的,作家的职责就是以更好的创作方法与技巧,以小的切面进入和触及、解剖和刻画,对人类整体命运进行更具艺术性的关切与呈现。每一个地域的人群之所以绵延不休、生生不息,其最根本的支撑力就是他们在漫长岁月中创造和积淀的独特文化及其文化精神。在乡村,优秀文化的继承,需要更多人的身体力行和代代传承。而“人”不是抽象的,是我们长年累月在山野、工地、高速路之间奔波劳作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以及他们背后的白发父母、教室稚儿,也更是苍天下亿万人民在晨光与暮色中的继续背影。辽阔的乡村,广阔的人群,正经历着时代的巨变,体验着文化的转换。这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人类生活的改变不在于外部形式的改变,而只能基于每个人的自我完善。”在文化精神和心灵信仰赓续之间、转换之时,乡村题材创作自有广阔天地。

很多人意识到,乡村的很多变化,特别是乡村人的精神嬗变,没有得到很好的表达。而这正是文学艺术发生之地,也是作家的用武之所。在当下的时代,我们可能偶尔去到农村,看到村庄阡陌、山野河谷,流水的小桥、盘山的公路,看到以各种表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村人。可我们真的了解当下的农村和农民吗?了解他们的文化心理与精神结构吗?现在的中国乡村已经不再是鲁迅《故乡》《社戏》等作品中的乡村,也不再是萧红的“呼兰河”、沈从文的“边城”、孙犁的“荷花淀”、汪曾祺的高邮。这是一个更新、改良与新造的时刻,对乡村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的反思,对乡村人崭新精神风貌的发现,对人的心灵建设和精神建设,进行崭新的、具有创造力的、别开生面的文学表达和文学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

当下的乡土文学创作,主要笔墨放在了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等重大主题上。这些创作抓住了时代的主潮,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文学意义。但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对于乡村逐渐流变的文化需求和精神追求方面关注不多,用笔甚少。这应当是新乡土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着力点所在。

切。文学问题始终与更大的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息息相关。对绝大多数中国作家而言,其书写对象及灵感、题材来源,只能出自本土,进而朝着整个世界,方式方法上的多种多样是艺术之道,而支撑文学作品伟大性的,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同情与悲悯,是对人性幽微的深刻洞察与艺术表达,是对人类世界精神之高峰与巅峰的眺望和攀登。

期待能够引起广泛精神共鸣的作品

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期待能够涌现出一批引起广泛精神共鸣的文学作品。这些年来,每次回到乡村,躺在虫鸣与鸟叫的夜里,总是想起年少轻狂时夜夜读书的种种情景,往往读得彻夜不寐,还心潮澎湃,哭笑无常,完全不能自己,久久不能平复。优秀文学作品对人的情感和心灵的滋养、对精神与文化的鼓舞作用,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要具备持久的情感震荡力和感染力,二是一定触到了人的“痛点”“软肋”“心事”“梦想”,三是不断在内心和灵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拔节成长。优秀的文学作品,会让每一个阅读的人都深切地体验到一次隆重、炽烈或悲怆、悲壮的情感“炼化”与“抚慰”,更是文化和精神上的“增持”和“熔铸”。真正打动人、有着持久生命力的文学作品,除了斑斓复杂且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及其生动深刻的人性表现之外,最根本的是文学作品当中有着鼓荡不息的文化力量,有着引人共鸣的精神力量,有着文化上的自觉自信与自我超越。

当下的乡村题材创作,期待的就是这样的一批优秀作品——它们所塑造的人物立体生动,所体现的情感动人,所传达的精神具有感召力。乡村文明不断遭遇新的语境,原有的乡村文化精神正处在转折、发展的进程中。当下的乡土文学创作,需要更精准地捕捉乡村人的精神嬗变,更深切地关注乡村人群的心灵建设和信仰建设,以敏锐的发现、深度的思考、艺术的创造,写出乡村文化精神的魂魄与精髓,写出乡村文化精神在嬗变时刻的慌乱与艰难、不舍和创新。这应当是新乡土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着力点所在。

(作者系四川作家)

声音

诗歌与音乐是近亲,起初同是对于声音的创建。声音满足于听觉的诉求,作用于我们的情感。这种情感回应的张力的张力,并顺乎声音指向逝去的世界。所以,我们无法占有声音,一如我们无法占有时间。同样,我们亦无法占有诗歌,诗歌是存在。因此,诗人并不创造诗歌,而是通过诗歌创造自己,从中体验生命的真理。

那么,既然诗歌在本质上追随的是逝去的世界,故而诗人所行进的道路便不得不是通往起点抑或说通往历史的道路。就此说来,令诗人欢喜的从不是得到,他们时刻在意的只是如何不失去。于是,回忆便因此成为诗歌存在的必然方式。

在柏拉图看来,回忆即是理智。而在我看来,这里所言的理智即是思想。思想旨在对真相的揭示,真相的反义词不是假象,乃是希腊语当中的遗忘。也就是说,唯有拒绝遗忘方能保证我们成功接近真相。诗歌的回忆恰是之于遗忘的抵抗。

然而一直以来,始终有那么多的诗人在叫嚣着诗歌不需要思想。奥克塔维奥·帕斯就说过,诗歌并不表达诗人的思想,它仅仅表达诗歌本身。华莱士·史蒂文斯也说过,诗歌应该几乎成功地摆脱掉智力。对此,美国诗评家海伦·文德勒曾经总结道:“诗歌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体裁,表现力长于逻辑性,更倾向于沉思冥想,而非条理清晰或站得住脚的论点。”显而易见,帕斯们错将思想当作生硬的理念,担心其人为的教条很难不消弭诗歌的纯粹。

但在实际上,文德勒是正确的。她说:“简而言之,诗歌与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不稳定的关系。不同于一场争辩行为,有些规律总是支配着一首诗,即使这首诗的意图关乎思想的演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序语言的技艺,即使一首诗看起来是一种感情的自然爆发,它也只是由一种被称为思想的东西来指导的。”更何况,索绪尔也早就说过:“可以把语言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

必须认识到,诗歌的声音是赤裸的,思想的真相也是赤裸的,它们之间从来就是单纯与单纯的相遇以及单纯与单纯的结合。不同的是,思想致力于避免让这种单纯沦为单调或单一,所以,基于丰富单纯的使命,思想常常试图冒险穷尽复杂。正如法国哲学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所说:“单纯的对立面不是复杂,而是虚假。”可见,无论多么复杂和深邃的思想都只能是真诚的,这恰恰就在于它的单纯。

当然,我们有必要注意到,诗歌思想的单纯性是由其听觉本质所规定的。较之于视觉,听觉偏爱简单和重复,耽于怀旧和不舍。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大量费解且晦涩的诗歌存在是个不争的事实。不过,我要指出的是,这些诗歌所表达的不一定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反面。由于违背了单纯的伦理,很多诗歌呈现出的所谓“深刻”其实就是一种刻意的欺骗。

故弄玄虚的伎俩在听觉的场域里没有用武之地,它之所以能够得逞,完全是由于语言的文字化使然。文字的出现导致诗歌的声音属性被置于目光之下,变成视觉的对象,以至于诗歌固有的音乐含量渐遭稀释,甚至连脚韵都开始变得无所适从。视觉征服了听觉,文字收编了声音,诗歌不是那么容易葆有纯真的面目。既有的声调轻重、节奏缓急以及唇齿和呼吸,统统让位给了文字。索绪尔说,文字是语言拙劣的衣裳,恰是借助于文字,诗人们学会了伪装。他们把所有占有的欲望都塞进了文字的衣裳。诗歌从此被彻底空间化了。

想到诗歌的责任,我们怎能想不到回忆?想到回忆,我们又怎能想不到思想?思想提示我们,诗歌必须凌驾于文字的权威之上,没有思想就没有诗歌的想象力,恰若屈原《天问》的想象无疑与他的思想息息相关。为了真诚和自由,诗人有充足的理由反抗文字逻辑的束缚,无视它的语法规则和视觉体面。口语诗歌的出场正是这样一种自觉的反抗,但它不能仅仅止于对书面语言的敌对,否则势必难免陷入粗鄙化与情绪化的窘境。

终究,口语诗歌仍需回到思想那里,这才是诗歌的正途。回忆和思想是诗歌的正反面,回忆是面向过去的姿态,思想则是面对未来的挺进。诗歌就是凭借这一形式实现了前进与倒退的统一。本雅明在阐释保罗·克利的画作《历史的天使》时,曾特别提醒我们,历史天使总是倒退着前进的,因为她的面部始终朝向过去。

这同样也是诗歌前进的方式。诗歌不大理会方向,它只器重身体的姿态。换言之,诗歌不必操心去往哪里,它最牵挂的是如何行走。对诗歌而言,它的前进就是倒退。故此,诗歌不属于未来,它的前方永远滞留在过去,而未来则在其身后随时等待着成为过去。诗歌所拥有的只是不断失去的当下。须知,当诗歌把过去视作未来时,这意味着它永不背叛的承诺。而当诗人遗忘了自己的嗓音时,却这意味着他已然迷失在了文字的丛林里。

松尾芭蕉说,如果你想写松树,你成为不了松树,但你可以向松树学习。试问,没有思考,诗人又该如何学习?再想想惠特曼那些直抒胸臆的诗篇,其魅力不正在于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考方式吗?

最后,我想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印证诗歌的这种真谛:“写诗就是回忆,回忆就是创建。”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2023·星星年度诗歌奖”颁奖

本报讯 日前,“2023·星星年度诗歌奖暨第三届文理杯大学生诗歌作品大赛”在四川成都颁奖。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张颖,《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副主编童创,成都文理学院院长刘学民、校长喻洪麟、党委书记高华锦,以及获奖诗人、评论家参加活动。

“星星年度诗歌奖”由四川省作协与成都文理学院联合主办。在2023年度评选中,诗人周所同以组诗《比较学》(《诗刊》2023年第15期)获得“年度诗人奖”,张桃洲以论文《探求当代诗歌批评的“当代性”》(《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9期)获得“年度诗评家奖”,伯竑桥以组诗《夜半》(《星星·诗歌原创》2023年第7期)获得“年度大学生诗人奖”。

在颁奖典礼上,周所同说,写作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比赛,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吐故纳新。张桃洲认为,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要保持平等对话的姿态,既要尊重批评对象,又要与之保持距离;在表述上要力求准确,使诗歌批评做到真正的自立。伯竑桥谈到,在复杂的时代里,前所未有的种种当代经验扑面而来,诗人要拥有一颗完善而健全的心灵,才能处理好这些当代经验。

书写红军长征的青春赞歌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河南文艺出版社承办的《三千里郎:从鄂豫皖到陕甘边》新书发布暨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河南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梁朝,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庆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会议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主持。

为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三千里郎:从鄂豫皖到陕甘边》近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该书讲述了红二十五军长征故事,全景式再现了这支队伍历经艰险转战近万里的战斗历程。与会专家认为,《三千里郎:从鄂豫皖到陕甘边》为青少年讲好党史

故事、长征故事、中国故事树立了一种典范,也对新时代文学如何从红色文化资源中汲取精神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作出了积极有力的探索。这部作品不仅是对红二十五军长征历史的深情回顾,更是对长征精神的生动诠释和传播。作为一部激发青少年增强志气、骨气、底气的生动教材,该书通过细致的历史叙述,唤醒人们对红二十五军这支“娃娃军”及其精神的记忆,也通过回望历史召唤当代年轻人继承并发扬长征精神,为新时代奋斗。

该书作者尹霞谈到,自己想讲述满怀理想、积极向上、充满力量和智慧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故事,以此激励当代青少年从中汲取奋发进取的力量。(康春华)

专家研讨文艺评论守正创新之道

本报讯(记者 王冕) 置身新时代,如何适应新变化新常态,是摆在文艺评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6月13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北京市文艺研究与网络文艺发展中心承办的“新时代北京文艺评论的守正创新之道”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赖洪波,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评协主席王一川及解玺璋、陶庆梅、杨庆祥、李林荣、颜辉、季亚娅、林蔚然、于洋等专家学者与会,围绕北京文艺评论如何守正创新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研讨会由北京市文联宣传部副主任柴莹主持。

与会者认为,文艺工作者需思考新时

《谁持彩练舞山川》在浙江首发

本报讯 6月7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浙江人民出版社、长兴县委宣传部主办的长篇报告文学《谁持彩练舞山川》新书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在浙江湖州长兴县举行。

报告文学作家孙侃创作的《谁持彩练舞山川》全书20余万字,讲述了“鸡鸣三省”之地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全景式展示了浙江省长兴县加快绿色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是首部叙写落实“双碳”目标浙江范例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新书首发式上,

代北京文艺“新”在何处,寻找提炼彰显首都气派的北京文艺新形态,在总结以往文艺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创新之路。新时代北京文艺评论要继承独具中国特色的文艺理念和方法,强化家国意识和政治担当,不但要立足北京,更要放眼全国,从不同学科角度切入讨论文化热点现象,展现真知灼见。北京评协要进一步加强联动机制,更好地开展问题归纳、品牌推广、理论研究等工作,加快培养适应网络传播时代的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有效引导文艺创作。

据悉,北京市文联今后将总结吸纳相关建议,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加强联动机制,助推北京文艺评论事业繁荣发展。

有关方面领导和嘉宾共同为新书揭幕。书中典型代表,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党委书记、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介绍了新川村从落后山乡蝶变成美丽乡村的过程。在作品研讨会上,十余位专家学者从社会意义、文学价值、艺术特色等角度围绕该书展开了研讨。大家认为,《谁持彩练舞山川》记录了以煤山镇为代表的湖州长兴地区如何转型成为绿色、低碳科学发展的共富示范镇,以文学的方式书写了“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的生动样本。

魏明伦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魏明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5月28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3岁。

魏明伦,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剧本《易胆大》《四姑娘》《岁岁重阳》《巴山秀才》《潘金莲》《夕照祁山》《变脸》《中国公主杜兰朵》,杂文集《巴山鬼话》《魏明伦短文集》《魏明伦随笔》等。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称号、全国优秀剧本奖等。

张守仁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杂志原副主编张守仁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5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张守仁,笔名青江,中共党员。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

集《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你就是爱》《寻找勿忘我》《爱是一种伤害》《永远的十月:我的编辑生涯》《名作家记》,译者《道路在呼唤》《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集》《屠格涅夫散文选》等。曾获中华短散文大赛奖、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等。

郭蔚球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文联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郭蔚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6月1日在南昌逝世,享年93岁。

郭蔚球,笔名白雁文,中共党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诗《青春与理想》,诗集《美的追求》《爱的长河》《冬恋》《云海漂流》等。曾获江西省人民政府文艺创作一等奖、江西省谷雨文学奖、江西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